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王改娣, 潘 丽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 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 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 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诗歌; 中国新诗诞生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2)03-0178-04

The Birth of Chinese New Poetry in the May 4th Period in a Polysystemic Perspective

Wang Gaidi, Pan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e May 4th Chinese New Literature, especially Chinese New Poetry, 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ranslated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system theory, the translated poetry, being the core of the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May 4th period, helped to break the writing mo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Consequently,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llap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paradigm as well as the birth of a new cultural system. Those like Hu Shi, Liang Shiqiu and Guo Moruo are all new poets, whose writing of new poe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translating foreign poetry. In short, translated poetry is the main force of the birth of Chinese New poetry.

Key words: polysystem theory; translated poetry; birth of Chinese new poetry

文学翻译是翻译文学形成的先决条件, 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必然产物。在文学翻译过程中, 翻译家所选取的原语文本通常是异域文化的文学经典, 对其所在国家的语言文学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时, 充满异国文化元素的翻译文学慢慢渗

透到译入语国家的文学系统, 对该国的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那么翻译文学在译入语国家整个文化系统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又如何反作用于本国的文学发展? 潘珏指出“多元系统”(polysystem)理论将翻译纳入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 体现了翻译

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的历史地位和现今的发展。吴已英还专门撰文介绍多元系统理论,认为该理论拓宽了翻译学研究的领域。这些研究证明,“有必要将翻译文学纳入多元系统之中,之前这样做的人很少,但是任何国家的文学发展史都不能否认翻译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在文学发展的共时和历时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1]。外国文学对我国“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形成的影响上。熊辉认为,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五四”时期译诗的启示。夏新宇则阐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形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下面将结合佐哈尔关于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地位的探讨,从译诗的角度考察“五四”时期外国诗歌如何对中国新诗诞生产生影响。

一、外国诗歌翻译与“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系统状况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当时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从一开始就高举反对封建文化的旗帜,推介西式的“民主与科学”,寻求思想和文化革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介绍易卜生主义,译载社会问题剧《娜拉之死》等作品,这开启了将外国文学经典引入中国文化系统的崭新历史进程。鲁迅、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田汉、周作人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当时,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的一些文学名著,从这时起较有系统地陆续被介绍给中国读者。

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导言》中,施蛰存指出:“从1890年到1919年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中国文化系统的现代化进程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起步。翻译文学作品在当时的中国呈巍然之势,并在文学系统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佐哈尔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的位置》中指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体系中的作用或者在译入语文学中所处的位置很难阐释,因为这种定位随着文学系统的运作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他认为,当文学多元系统尚未形成,处于兴建期,或处于边缘、软弱地位,或

当文学多元系统处于转折、危机或文学真空时期,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参与多元系统的核心构建^{[2]172-173}。“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正处于急剧变革的转型阶段,迫切要求与旧文学传统彻底决裂。对于建立中国新的文化系统而言,外力冲击是一种必要因素,没有这种外力冲击作为解构的力量,建构过程必然举步维艰,翻译文学在特定的“文学兴建期和转型期”便成为一种有效的冲击力。“五四”新文学运动内部存在着一个与同时代的文学主流“断裂”的形态,而从晚清、民初文学向“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则是当时中国文学的主流。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学凭着敏感的特性,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回应社会破旧立新的先声^[3]。

外国文学的译介由于顺应了人们克服中国文学危机的文化心理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师法域外文学,改造乃至重建中国文学”^[4]。在向域外世界求索的过程中,对外国诗歌的翻译自然成了这一时期中国诗歌发展的合理选择。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吸纳传统诗歌审美观念的同时,将各种形式、各种风格和流派的外国诗歌翻译到中国,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成就了中国现代译诗史上的第一个翻译热潮。当时,译诗的主题和风格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浪漫派诗歌、象征主义诗歌、民歌民谣、史诗等都得到了大量的翻译介绍^{[5]45-50}。从译入语国家的接受情况来看,没有翻译诗歌,外国诗歌无法与普通大众亲密接触,影响受限。译诗使外国诗歌在普通的不懂外语的中国读者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卞之琳说:“译诗,比诸外国诗原文,对一国的诗创作,影响更大,中外皆然。”^[6]朱自清认为译诗“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7]。

二、外国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兴起

对于中国文学,“就20世纪文学领域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翻译家催生出了新生代作家。事实上,1919年前后的整个白话文学运动正是从外国文学的翻译中获得了灵感。英国浪漫主义和惠特曼推动了中国白话诗歌的形成”^[8]。中国新诗在主流文学中地位的确立与译诗所起的媒介作用密不可分。译诗对新诗运动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新文化运动伊始,各种思潮和理论的译介,各种创作技巧和文学模式的推广,在各个方面推动了诸多文学团体的形成。较早出现的“新青年社”,翻译外国诗歌是其新诗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继之而起

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新月社”等新文学社团,既是新文学的创作团体,又是翻译文学团体。同时,“五四”时期的很多诗人也是出色的翻译家,他们一边翻译外国诗歌,一边从事新诗创作,将外国诗歌的艺术技巧和形式潜移默化地融入诗歌创作。许多新诗运动的先行者则明确提出要以翻译诗歌作为中国新诗创作的榜样和发展方向^{[5]48-49}。对于20世纪外国诗歌的翻译,“选材”这一问题显得特别重要。“什么样的作品给大量翻译过来?为什么这些作品会在这特定的时空受到垂青?这些作品有什么共同的特点?这些作品跟中国原有作品的分别在哪里?”^[9]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译本的选择取决于原语文本能否引入新的文学模式,以取代既定的不再有效的陈旧模式。本土多元系统的环境包括社会的和文学的因素,是选择原文本的重要依据^{[2]172}。比如在“五四”时期,外国诗歌译介中,中国诗人和翻译者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关注度非常高,这一现象与“五四”时期的时空氛围息息相关。从反传统、反主流的立场出发,中国的文学系统选择了英国革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Noel Byron, 1788—1824)、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等人的诗歌译本作为中国新诗新形式的指向标,引导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当时郭沫若和成仿吾翻译了10余首英国诗歌,其中9首是雪莱的作品,明显表现出对浪漫派的偏好。这正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的、文学的因素”所决定的,因为“五四”时期着重强调的是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学的思想启蒙作用。18世纪影响英国诗歌进程的是浪漫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人的一大共同特征就是对诗歌语言和诗歌形式的改造。这种具有语言反叛精神的诗人,在文学变革时期的中国受到了欢迎,并对中国新诗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浪漫主义思潮萌芽于20世纪初。其时拜伦的《哀希腊》有3个译本(译者是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相继问世,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介绍‘恶魔’诗派的叛逆精神及其文学观。在历来崇尚儒家理论和诗教传统的中国,现在忽有人要公开地为‘恶魔’诗人评功摆好,认为他们是中国当下所期待的‘精神界之战士’,热情阐发他们表现主观激情、饱含强烈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这不能不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明,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在背离传统的价值观,一种新的文学潮流正在酝酿之中”^[10]。“摩罗”诗人即“恶魔”

诗人,指以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1]。这些诗人在“五四”时期受到中国新诗人的推崇。

“五四”时期“文学翻译家们出于改造社会的责任感,介绍外国的先进文化,对抗黑暗的封建旧文化,推动新文化运动。他们把这种社会责任感转化为驱动力,在翻译中把作为传统文化语符的文言体解构,译者的人性观、审美观和文化观从传统的桎梏中被彻底地解放出来,从根本上摆脱旧文化的束缚”^[12]。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为满足一种新兴文学的需要,在尽可能多的文学类型中使用新近创建的或革新的语言,以使它成为一种文学语言并服务于刚刚出现的读者。当译入语国家的文学系统处于转折时期,出现了文学“真空”时,外国模式则更容易渗透^{[2]173}。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的诗歌发展正处于这种破旧立新的非常时期,急需借助外来力量颠覆传统,借助汉译外国诗歌来创新。汉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此时为中国新诗诗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三、外国诗歌翻译与中国现代白话诗体的形成

1920年胡适节译了美国女诗人莎拉·替斯代尔(Sara Teasdale, 1884—1933)的一首抒情诗《关不住了》(*Over the Roofs*),并将其收入自己的诗集。胡适自言:“这个时期,六年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13]这首译诗不仅仅开创了胡适新诗创作的纪元,实际上也开创了20世纪中国现代新诗的纪元。因此,翻译文学在颠覆传统意识形态和审美习惯,同现实环境和传统文学彻底决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历程就反映了外国诗歌影响的轨迹:“‘五四’运动触发许多诗歌流派的诞生,比如浪漫主义诗派(郭沫若),大众化诗派(刘半农),小诗派(谢冰心),湖畔诗派(冯雪峰),新古典主义诗派(冯至),新格律诗派(闻一多),革命诗派(蒋光慈),象征主义诗派(戴望舒)。总之,这些诗派和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国诗歌(包括东方和西方的诗歌)的启示和影响。”^[14]

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中,梁实秋同样主张:“要明目张胆的模仿外国诗……取材的选择,全篇内容的结构,韵脚的排列,都不妨斟酌采用。”^[15]这

正是当时新诗垦拓者们的创作写照:郭沫若认为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了“泰戈尔式”、“惠特曼式”和“歌德式”^[16]三个阶段,施蛰存在谈到诗歌创作经历时说自己“曾用斯宾塞体的脚韵法做过一首较长的诗”^[17]。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互动,使译诗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来,促使中国诗歌语言及形式的革新,推动白话诗风的发展,使中国新诗的诞生成为可能。同时,翻译诗歌也逐渐被主流文化接受,以一种无以替代的特殊地位成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以译文的形式寻求自身文学语言表达、技巧和观念等一系列变革的突破口,翻译文学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既充当了先锋,也是模板,而且已经融进了现代文学的源流之中。”^[18]梁宗岱认为:“不独传达原作底神韵,并且在可能内按照原作底韵律和格调的翻译,正是移植外国诗体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19]孙大雨曾创建了新诗格律形式的“音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说是英语诗歌的音律理论的横向移植,并采用英语诗体进行创作,写出了第一首实践这一理论的十四行诗《爱》。刘半农的《爱它?害它?成功》则是效仿英国诗人皮科克(T. L. Peacock, 1785—1866)的诗作《橡树和山毛榉树》(*The Oak and the Beech*)所作,尤其是第一诗节,实则是原诗的中文翻译^[20]。

“五四”时期的很多诗歌翻译者本身就是诗人,著译不分是“五四”时期诗歌的一大特征。许多新诗创作者视译诗为创作作品,将其收入作品集中。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编集《新诗集》,收有孙祖宏翻译的《穷人的怨恨》、郭沫若翻译的《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王统照翻译的《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诗集——胡适的《尝试集》,也把译诗《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哀希腊歌》、《墓门行》收入在内。1952年,胡适编选《尝试后集》时,仍然把雪莱、歌德等人的译诗收入其中^[21]。

《分类白话诗选》(许德邻编)的第一首是郭沫若译歌德的诗《暮色垂空》。郭沫若尝试将中外名词夹杂在一起,选择现代科学名词作为新的诗歌语言,与中国传统诗歌语言大相径庭。类似这首译诗的欧化语言正是“五四”新诗形成时期的现代白话模板。“五四”新文学的大量欧化语言的产生,与传统的白话文自然而然的发展轨迹并不是一回事,这是另外一个语言系统进入中国,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可以说

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语言空间^[3]。在某种意义上说,欧化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西方的语法结构形成了中国新诗基本的雏形。

四、结 论

“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诞生,直接受益于当时外国诗歌的翻译热潮。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系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中国固有文化系统相抗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翻译文学凭借异国情调和世界语言,打破中国文化的传统范式,甚至一度占领了多元文化系统的中心地位,帮助新文化系统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新诗的创作理念和实践,“翻译犹如开窗,可使阳光射入,犹如打开硬壳,以便吃到果仁。”^[22]汉译外国诗歌作为当时翻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彻底区别于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经验和资源,为中国新诗的形成提供了全方位的模板,成为中国新诗诞生的源泉。正如王宏印在其《新诗话语》中所述:“中国现代诗的产生,假如没有外国诗的冲击和推动,以及对外国诗的借鉴和利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多元系统理论引领我们关注文学系统之间相互运行的机制,从多维度更好地认识到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化系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葛校琴. 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2] 埃文-佐哈尔·伊塔马.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C]/[美]大卫·达姆罗什, 陈永国, 尹星. 新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3] 陈思和.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 1-17.
- [4]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5] 熊辉.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D]. 成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07.
- [6] 卞之琳. 人与诗: 忆旧新说[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 [7] 朱自清. 新诗杂话[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 [8] 王佐良. 论新开端: 文学与翻译研究集[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1.

(下转第192页)

